

不屈的共产党人

5

不屈的共产党人

(5)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倪天福

不屈的共产党人
BUQU DE GONGCHANDANGREN

(五)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3印张 259,000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00

ISBN 7-01-000253-3/D·112 定价 3.35 元



黄 爱 (1897—1922)



杨 公 (1898—1927)



龙大道 (1901—1931)



周逸群 (1896—1931)



黄公略(1898—1931)



李硕勳(1903—1931)



刘天章(1893—1931)



林 青(1911—1935)



陈为人(1899—1937)



钱泽生(1903—1939)



黄绍辉(1912—1949)



谭植棠(1893—19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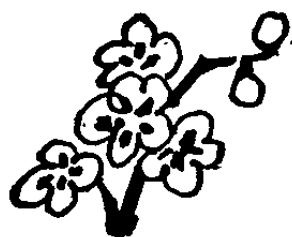
目 录

“中国的卢李”	1
黄爱、庞人铨传略	
四川的革命先驱	30
王右木传略	
将热血和赤心献给人民	57
杨闇公传略	
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牺牲的十位烈士	96
胡焕文、吴道南、莫奇标、高超、曹渊、赖元良、李海涛、 江标远、蔡文铎、练国良传略	
北伐时期的“铁军”党代表	118
廖乾吾传略	
民族仪范 工运先导	129
龙大道传略	
湘鄂西革命火种的传播者	150
周逸群传略	
“投荒绝域，公忠不忘”	188
杨匏安传略	
“偏师借重黄公略”	211
黄公略传略	

“遗骨琼州何处觅,喜看红日照天涯”	241
李硕勋传略	
丹心铁骨 正气凛然	271
刘天章传略	
“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	291
林青传略	
一切为了党的事业	305
陈为人传略	
“到死还是坚持着共产党员的气节”	344
翁泽生传略	
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	370
黄绍辉传略	
丹心一片贯平生	388
谭植棠传略	
《不屈的共产党人》(1—5辑)简化目录索引	411

“中国的卢李”

黄爱、庞人铨传略



六十多年前的一个黑沉沉的寒夜，朔风哀号，雪花纷飞，在湖南长沙浏阳门外，一排排荷枪实弹的敌军如临大敌，颤栗地鹄立在大路两旁。两个英俊的年轻人，带着镣铐，昂首挺胸，步履艰难，行进在雪地里。敌人砍杀了这两位年轻人，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附近的雪地。这两个年轻人是谁？他们就是号称“中国的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黄爱、庞人铨。

一九二三年一月，周恩来在德国写的《赠卢李像片》信中说：“明日又是黄爱、庞人铨的

血祭之日”，“去年的昨日，中国的北京、广州、上海，开了很盛大的卢李纪念会，隔两日长沙浏阳门外雪地便演了‘中国卢李’身首异处的惨剧。”黄爱、庞人铨就是踏着卢李的血迹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英勇捐躯的。他们二人是我党成立后最早牺牲的先烈。

黄爱名正品，字建中，一八九七年出生在湖南常德县城东门外的一户小康人家（即今常德县芦山乡小井巷黄家屋场）。父亲黄一尘，粗识文字，原务农，后经商，迁居常德县城。母亲生四男一女，黄爱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他七岁发蒙，在常德县第四学堂读书。由于水旱灾害连年不断，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他的家境每况愈下。不久，姐姐被迫辍学；家里唯一能够从事生产的三哥去世。到了黄爱小学毕业的时候，家里已无钱供他升学，父亲只好送他到城内一个商店里当学徒。

黄爱的二哥叫黄瑞清，在热河民政厅做事。黄爱当学徒不久，给二哥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幸受了二十世纪的小学教育，稍明白了一点事，如何肯从此罢休？况且营商是专门牟利的，充其量弄得个衣丰食足，独善其身罢了，是这样人生有什么价值？现在身入其境，目经商场一切鬼怪现象，尤其一刻难过，又如何终身从事此道呢？家庭不是不许我继续求学，只不过是经济上不可能。只要你能应我最低限度的经费，我情愿去做一个苦学生。”二哥决定在经济上给黄爱以援助。一九一三年秋天，十六岁的黄爱跋山涉水从常德县城来到省会长沙，考入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在这里他结识了同学庞人铨，并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与他志同道合，生死与共。

庞人铨字寿纯，别号龙庵。一八九七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清宁镇八三岐（现湘潭县楠竹山乡望梅村）。父亲、母亲祖辈都以耕田为业。人铨有兄弟五人，他排行第五。大哥是个忠厚诚实的书生，以开馆教学为生；二哥一生行医；三哥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四哥人键是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任湖南省总工会秘书长，秋收起义时，参加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工作，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就义于长沙。人铨两岁丧父。母亲是一个贤德有才、具有爱国思想的先进妇女，对于子女教育很重视，尤其怜爱年纪最小的儿子庞人铨。人铨五岁时就跟着母亲认字。开初，他有些粗心大意，母亲对此很不高兴，用历史上有成就的人从小就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地求学的故事来教育他克服这个毛病。不久，人铨就读于附近的私塾，学习很认真，深为师长所称道。人铨七岁入庞氏族学，不到两年就学完初小课程。但这时该校老师多是冬烘先生，只教寻章摘句，人铨对此很不满足，他说：“做个舞文弄墨、老死牖下的书生，决不是我所取的。”

人铨初小毕业后，考入湘潭县西路高等小学。恰巧这时，庞氏族学缺少教音乐、体操课的老师，人铨便自告奋勇，利用课余时间担负这项工作。一年后，他考入湘潭县楚山观高等小学，后因病辍学回家。一九一一年暑假，他见庞氏族校经济困难，无力在外聘请教员，便主动提出不支薪水到学校教课。数月后，辛亥革命爆发，湖南宣告独立。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候，不少豪绅借此诽谤革命，妄图加害于工农。庞人铨仗义执言，力排众议，他在给地方绅董的信中，写道：“人性就善，非迫

于饥寒，何忍铤而走险。”再三强调要对这些人进行教育，明确提出“提高农工，为救亡济世之唯一要素”。与此同时，他与族校教职员一起，整顿校务，革新教学，只一年多功夫，就使学校气象一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湖南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勾结封建官绅杀害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篡夺了革命领导权。一时反动势力复辟，社会上沉渣泛起。人铨对此痛心疾首，于一九二三年毅然辞去了教学工作，从湘潭来到省会长沙，考入了湖南省甲种工业学校（简称“甲工”）染织科，适与黄爱同学。

在甲工，黄爱、庞人铨发愤攻读。黄爱长于数理、英语；庞人铨爱好文学；以“龙庵”的笔名，在长沙各家报纸上发表小说、诗歌等，曾写过“愿以铁锤平社会，欲将机杼织人生”的脍炙人口的诗句。据有关同志回忆：当时“湘中报纸凡著着龙庵之文字，靡不受阅者之欢迎”。一九一四年，甲工校友会准备刊行杂志，人铨被同学推举任编辑。在这个杂志的第一期里，他写的《我之家庭》，以真挚的感情，刻画了他母子之间深沉的爱，感人肺腑，受到好评。由于他接受新事物快，对旧社会的黑暗腐败深恶痛绝，因而笔锋所至，群丑震怨。虽然他的文章为读者所喜爱，可他投给报刊的稿件，往往因编辑人员怕担风险不敢为之披露。为此，在一九一六年，他邀集同志编辑了一个季刊，定名为《九十天的杂志》。在那黑暗的旧社会，言论自由只是块招牌，不久，这个刊物因经费困难和种种原因被迫停刊了。

一九一七年初秋，黄爱和庞人铨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甲工。黄爱和庞人铨不象那些庸人只为谋求个人“金饭碗”而奔忙，而是想用他们的铁锤和机杼去实现“工业救国”的理想。黄爱毕业后到湖南电灯公司做工；庞人铨则回到家乡，在湘潭织布厂当工人。

黄爱在电灯公司工作得很出色，为公司测绘的长沙市电流分配图深为员工们钦佩。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立志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一年后，他把节衣缩食省下的钱，作为学费、川资，离开长沙前去北京投考高等工业学校。但因误了考期，滞留在北京。此后约一年间，他靠翻译稿件等工作勉强糊口。一九一八年秋，他到天津插班考入直隶高等工业学校。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天津学生积极响应。黄爱全力投身于这一运动。他担任过由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日报》的编辑；参加过天津学联执行部工作。在这里，他对编辑工作非常尽职，常为日报撰写文章，并投稿天津各报。他努力完成在学联执行部担负的各项工作，学联的干事评议员，没有一个不尊敬他的。

八月间，山东镇守使马良枪杀了回教救国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位领导人。天津各界联络华北各省群众进京请愿。黄爱被推举为学生会的请愿代表。到京后，他与北京学联洽商，会同北京各界人士，于八月二十六日到新华门向总统府请愿。请愿代表在新华门被军警包围，露宿三天。黄爱因身体太弱患病，后被送往朋友处调养。八月二十八日，反动军警毒打和逮捕学生代表，黄爱因病免受其难。这次赴京请愿的实践，使许

多人觉悟到：向军阀政府请愿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要根本改造社会，就需要唤醒学生和民众的觉悟”，“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于是，这年九月十六日，周恩来、邓颖超、谌志笃、郭隆真等二十多个男女青年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里，正式成立了“觉悟社”。不久，黄爱与王贞儒、李愚如等人一起，加入了“觉悟社”。

在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黄爱也和同时代的许多先进青年一样，他走过一些曲折的路。开始，他认为牺牲是成功的代价。要救国只有作激烈的牺牲，用热血来唤起国人的醒悟。因此，他曾决议组织牺牲十人团，先由第一团的十个人带着最激烈否认北京政府的传单赴北京请愿，并在新华门散发，以激怒北京政府将这十个人逮捕枪毙。这十人牺牲后，其余的人就分别向各处发动，“以激起最激烈的群众运动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他的这种过激的主张，显然是幼稚和行不通的。所以，他虽挺身而出甘当第一批十人团的成员，可是支持和响应的却寥寥无几。后来经过多方劝阻，组织牺牲团的事才未付诸实行。然而，黄爱仍亟望作激烈的牺牲，以身殉国。这年九月，天津各界联合会邀请各省区代表到北京为山东问题再一次请愿。九月底，天津、南京、武汉、河南、湖南等七个省区、三十二个代表抵达北京。黄爱作为天津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与各省代表一起于十月一日上午赴总统府请愿，并参加了北京市民的示威游行。当时，他又准备猛力冲入总统府，以手枪自杀，借以激励国人。后经天津代表和北京学联的同学再三劝阻，才终止了这一行动。十月一日晚上十点，北洋军

阎政府的一百多名警察将全体请愿代表逮捕了。黄爱和代表们一道被捕，在北京拘押了四十天，直到十一月十日，经北京学联和各地声援，他们才被释放出狱。在狱中，黄爱表现很坚定，他的言行深为同学们所称赞。

黄爱出狱后，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校的行政人员竟诬蔑他是一个“暴徒”，借口他旷课太多将他开除出校。他虽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但并不以为意，从此，他立志弃学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同当时在津的许多预备留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在一起，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并在他们组织的一个工人补习学校教课。暇时即去找天津学生会的男女同志议论各种社会问题，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由于黄爱在北京被捕期间，在狱中结识了一批北京大学的进步同学，经过这些同学的介绍，他认识了李大钊。一九二〇年初，他离天津去北京，听了李大钊的讲话，读了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关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从中领悟了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的真理。这年一月下旬，天津学联调查委员会发现奸商私藏日货不报，并勾结日本浪人殴打前去调查的学生，各界群众纷纷提出抗议。警察厅长杨以德竟封闭各爱国团体，毒打示威请愿的学生，拘捕了周恩来、郭隆真等代表。黄爱闻知周恩来等同志被捕并在狱中绝食，悲愤已极，即由北京返回天津，组织声援活动。七月十七日，反动派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将周恩来、郭隆真等代表全部释放。随后，黄爱返回北京。在北京，他积极参加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但因工读互助团本身存在的许多矛盾无法解决，

黄爱到工读互助团不久，便看出这里面一些组织不得法的地方，提出一些改进的建议，互助团的人们，对于他的建议，不大注意，他便退出来了。随后即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继续求教于李大钊，开始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社会问题。

一九二〇年春天，黄爱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陈独秀处作缮写和校对工作。但他很想实际从事工人运动，便于六月中旬经陈独秀同意从上海到汉口。原先打算在汉阳兵工厂工人中开展工人运动，但因汉口当时在北洋军阀严密控制下，不易下手。加上他连续收到父亲和哥哥的来信，催着要他回去。于是他就决定回长沙进行活动。离汉口后，他先回家乡常德住了一段时期。九月中旬，才从常德来到长沙。恰巧这时，他遇见了在长沙寻找工作的庞人铨。

庞人铨自甲工毕业以后，仅在湘潭织布厂做了一年的工。一九一八年，便与专学织布的杨佩岐结了婚，夫妻俩满怀信心地在家乡办起了家庭织造社。他的母亲看到儿子和媳妇志趣相同，努力愤发，心里非常高兴。然而军阀张敬尧横征暴敛，抢劫掳掠。人铨虽僻居乡间，也无法幸免。家庭织造社几经抢劫，便一空如洗，不得不宣告破产。严酷的现实开始使他认识到：“今日的中国，军阀与资本家合伙作恶，明抢暗夺，劳动者莫作那种自食其力的梦想！”然而庞人铨并未就此灰心，他不屈不挠，继续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觉得：“强盗式的军阀部队是压迫人民阻碍社会进步的工具，为了免除湖南人民受军阀张敬尧的祸害，又不得不暂时利用他们。”于是，他抛开了机杼，从军入伍，在湘军陈嘉佑部做副官。“五四”运动

后，湖南人民掀起了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由于他对旧军队的反动本质有深切的了解，对张敬尧部队的情况比较熟悉。因而“在驱张一役，效力甚多”。一九二〇年夏，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张敬尧的部队退出湖南，人铨毅然退出了军队。一次，他回家省亲，在后山竹林里掰得一笋壳，随即制成一把扇子，并在上面题了一首诗：“世间作扇多绫羽，此独山间竹制成，拿来岂为驱蚊蚋，一扫人间太不平。”怎样扫除不平呢？这时他并未找到答案。他想“到民间去”，唤醒民众；又想“白天织布，夜间读书”，作一个完完全全的工人。正在苦闷彷徨之间，他和黄爱在长沙不期而遇了。

长沙这时同样很不平静。广大工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重重压榨下，生活极其痛苦。他们每天劳动十二至十六小时，工资却只有二十枚铜元，就连这点少得可怜的工资，也往往发的是不值钱或不兑现的“官票”、“鸟票”、“市票”，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无法维持；还要受尽军阀资本家的苛斥、虐待和凌辱。不少工人力谋反抗。无政府主义者这时在长沙甚为活跃。黄醒、盛野人、袁绍先等人，在原来创办的《健康书社》和《大同合作社》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安社”，极力宣扬“安那其主义”（即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组织“星社”也在长沙成立，并发表了第一次报告。他们都不遗余力地在知识界和部分劳工中鼓吹无政府的学说。应军阀政府的邀请，杜威、罗素、张东荪等中外学者，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联翩来到长沙，他们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诱惑进步人士和工人放弃阶级斗争，要人们以教育作手段来实现改造社